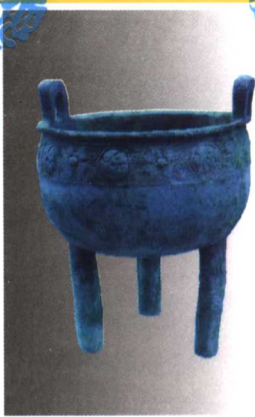


中国食品文化文献举要

徐兴海
袁亚莉
编著



中国食品文化文献举要

徐兴海 袁亚莉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食品文化文献举要 / 徐兴海 袁亚莉编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12

ISBN 7-221-06822-4

I. 中... II. ①徐... ②袁... III. 饮食—文化—研
究—中国 IV. TS9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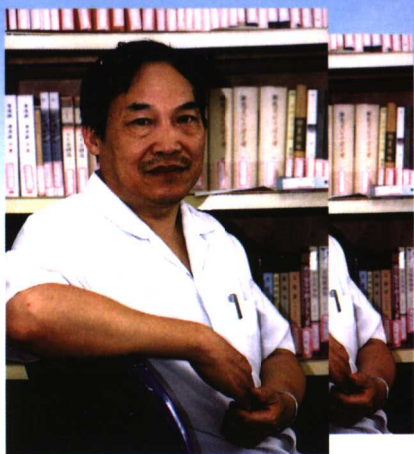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3431 号

中国食品文化文献举要

徐兴海 袁亚莉

责任编辑	孟筑敏
封面设计	彭秋敏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4
印 刷	无锡市俱进教育用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480 千字
印 张	16 印张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1-06822-4/TS·11
定 价	40.00 元

贵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徐兴海，1945年11月生，陕西省西安市人。文学硕士。现任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食品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出版专著《司马迁的创造思维》、《广雅疏证研究》、《雄才大略的君主》等三部，合著《中国学术思想编年：魏晋卷》、《中国古代论辩艺术》、《史学入门与文史工具书》、《姓韵》（点校）等多部，主编《中国食品文化论稿》、《儒家文化辞典》等多部，发表论文50余篇。



责任编辑：孟筑敏
装帧设计：彭秋敏



袁亚莉，1963年生。198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91年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文献学古籍整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就职于江南大学。

参与编写了《两唐书辞典》、《徐霞客研究古今集成》、《经贸文献信息检索》、《春秋史》等论著。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 第一节 中国古代食品文化文献 /7
- 第二节 中国古代食品文化文献分布特点 /21
- 第三节 中国近代食品文化著述概要 /27
- 第四节 中国当代食品文化研究成果概述 /28

第二章 中国古代食品文化文献及资料举要 /31

- 第一节 中国古代食品文化文献专著 /31
- 第二节 中国古代农书与食品文化文献资料 /104
- 第三节 食疗、食养、药膳与中国传统医学及本草文献 /122

第三章 中国食品文化与语言文字及史学 /152

- 第一节 中国食品文化与汉语言文字 /152
- 第二节 中国食品文化与古代史学 /165

第四章 科技政治文献与食品文化 /199

- 第一节 古代科技文献中的食品文化资料 /199
- 第二节 古代政治哲学宗教文献与食品文化 /208

第五章 古代文学文献与食品文化 /240

- 第一节 先秦至唐文学文献与食品文化 /240
- 第二节 宋文学文献与食品文化 /259

中国食品文化文献举要

第三节 元明清文学文献与食品文化 /269

第四节 历代小说与食品文化 /278

第六章 近当代重要食品文化文献 /309

第一节 近代重要食品文化文献 /309

第二节 当代食品文化研究专著及工具书 /312

第七章 饮食文化研究论文分类题录及文摘 /339

第一节 综论 /339

第二节 饮食文化史 /348

第三节 民俗 /366

第四节 少数民族饮食文化 /371

第五节 烹饪 /375

第六节 菜肴(菜系、满汉全席) /376

第七节 海外 /381

第八节 名人与饮食文化 /385

第九节 典籍、名著研究、书评、资料与文献研究 /390

第十节 茶文化论文 /405

第十一节 酒文化论文、其他 /453

第十二节 食品文化杂谈 /469

附录 /479

一、重要网站举要 /479

二、饮食文化节 /481

第一章 引言

本书所要列示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关食品文化的文献以及代表作,包括文献的载体、存佚、分类及其研究状况,揭示食品文化文献发生发展的规律,并且关注对这些文献的如何使用,说明当代的食品文献研究现状。

下面就本书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作如下讨论。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诗经·大雅·民劳》中就已经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句子,此处的“中国”指国家首都。后来的“中国”指华夏族、汉族所居住的地区,又指北方黄河流域。指称中华大地上所建立的国家是以后的事。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始专指我国全部领土。即此可知,“中国”是一个外延不断变化的概念,所指的地域及内容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着巨大的变化。本书所指的中国,是历史上的中国,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所指不同。

食品。《金史》卷一六有了“食品”一词:“谕太府减损食品。”《明史》卷五六:“蕃国从官坐于西庖下,酒数食品同。”卷八一:“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是否可说,至此“食品”一词方固定成为一个词组。在“食品”一词产生之前,“食”即指食品。食品,亦称饮食,包括主食、副食、饮料和调味品。

“文化。文化的“文”字是一个很早就有的字,甲骨文、金文中

即已有“文”字，“文”是妆饰、花纹的意思。《说文解字》中“文”字的意思更加固定，是“错化也”，意指交错所成的花纹和修饰。“文”最早所表示的是抽象的，所有两者以上相互交错、两种颜色以上相配、两种类型共存的现象均可以称之为“文”。汉字“化”最早写作“匕”，《说文解字》说“匕，化也”。从形体上看，这个字是两个人形体向背，所表示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与交换，也是彼此的影响和转化。

“文”与“化”两字的结合是后来的事情，意指文治教化之功，常常与“武功”相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主张以文化为先导，精神指导优先，而将战争视作最为罪恶的事情，所谓“兵者，凶器也”就反映了对战争的敬畏。

近代西方所进行的“文化”研究开启了文化研究的新时代，所用的“文化”概念已与中国古代决然不同。所指的文化是在人类与自然界协调、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人与自然界的其他一切不同，人有能动的一面，人在适合自然的同时又在改造自然，使之“人化”。自然界“人化”的过程，亦是人类所生活、所依赖的天地万物“人类化”的过程。人在改造自然，使其顺应人之生存的过程中，人也被改造。这个“文化”的概念就要大得多，宽泛得多，侧重点在人与自然的交流过程以及在这个交流过程中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一般的，将文化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1. 物态文化层次，以研究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标；2. 制度文化层次，大到政治、经济、教育，小到婚姻制度；3. 行为文化层次，涉及生活习俗等；4. 心态文化层次。本书所研究的“文化”，主要是心态层次的文化，研究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诸如审美情趣、思维习惯、价值观、人生观等等。

食品文化。食品文化研究必然涉及到第一层次的物质文化，第二层次的制度文化，第三层次的行为文化，又有第四层次的心

态文化。食品文化是对文化进行研究的最好切入点,因为食品本身是物质的,与第一层次密切相关;食品,或者更具体地说,粮食的生产状况,又与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税收制度、祭祀制度等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粮食的生产与分配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的核心与基础。中国的众多的节日无一不是与食品有着直接的联系,换一句话说,享用食品的种类与方式是区别节日的最好标志,因之,食品又与第三层次的文化直接相关。

本书所进行的食品文化研究以与食品相关的心态文化为中心,兼及物质文化及其他文化层次。对于食品的生产、加工等的技术基本不予涉及。具体而言,食品文化研究通过对于食品原料的生产、加工和进食过程中的社会分工及其组织形式,所实行的分配制度等的研究,以揭示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道德风貌、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心态、思维方式等等。

中国食品文化。研究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食品文化,中国人的心理、观念、思维方式、美学理念、民族心态等。

讨论中国食品文化,不能不提到一句名言“民以食为天”,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会引用这一句话,这是证明中国食品文化独特性的一句名言。此语出自《史记·酈食其列传》:“臣闻知天之为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为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此语为酈食其对刘邦所言。酈食其为刘邦早期的重要谋士,当时正当楚汉相争最紧张的荥阳大战之时,刘邦并无优势可言。酈食其所言乃高屋建瓴,从高处入手,从刘邦的需要切入,进而建策应占据成皋粮仓。此处的两个“天”对等,具有同样的意义。“王者以民为天”之天,是要求称王者以民为统治的基础,关切民的生存状态,以民的政治取向作为自己掌权是否稳定的标志,在民与王之间,民之态度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此一思想由先秦“民为本”而来,此处是追根求底,寻求取得

天下之根本所在：王者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结论自然而知：没有食，就没有王的天下。由此而知“天”之含义：根本的；不可改变的；主宰的；决定的；第一位的；不可替代的；基础的。与此相对应，“民以食为天”之“天”的意义亦应是相对应的。

“民以食为天”是一句政治名言，表面看起来是说明食物之重要，实质上是从政治的角度，从夺取政权的角度研究粮食的重要性，通过分析民、食、天三者之间的关系，说明粮食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民以食为天”其意义是：民以粮食为生存的基础，粮食对于民具有绝对的意义，其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对于夺取政权的人来说，粮食就是一切，粮食的占有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后来此语的引用者实际已经将其意推而广之，意谓对于统治者而言，没有食品供应给民，民就无法生存，民无法生存，王也就要灭亡了，因之说没有民就没有王，因之粮食的生产是第一位的，是王首先应该予以关注的，它关系到王朝的生死存亡；也因之粮食生产的政策是首先应该关注的，粮食政策成为国家生命之所在。

这句话对于后来中国的政治的影响是深远的。《汉书》的文献价值历来为人所称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直录了许多谏言、奏疏，例如关于民众生计的重视，对于粮食的关切。著名的贾谊《论积贮疏》，就直截了当地提出重视农业的问题，指出汉朝建立已经 40 年了，可是不论国家还是民户，粮食储蓄都少得可怜。如果收成差一点，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好过；遇到荒年，甚至要出卖爵级和子女，换得一些粮食活命。又如晁错《论贵粟疏》，提出应当提高粮食价格，对提供粮食者给以奖励等。

从政书亦可以得到印证。政书者，记载政治典章制度的书。唐刘知几《史通》是政书之首，其所以这样说，其一是因为它是现存的第一部政书，其二是因为它的体例、规模、编排为后来的政书所效仿。《史通》将经济放在第一位；唐杜佑《通典》分为九门，“食货”置于第一；南宋郑樵《通志》最富有创造性的二十略中就有“食

货”；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承接《通典》，更是将粮食的生产放在突出的位置。

以上都是从政治的角度讨论问题。从生活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有一句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全是有关吃喝的，都是食品，雅些称“饮食”。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不可须臾离也。

中国人讲究养生，药食同源是中国人特殊的概念。彭祖长寿的四个因素，导引之术、调摄、膳食、房中之术。膳食即其中之一。

在强调食品对于中国人的特殊意义的时候，不是说中国以外的国家和民族不重视食品。费尔巴哈说：“心中有情，脑中有思，必先腹中有物。”就证明了这一点。只是需要说明的是，在世界文化人类学家的眼里，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对饮食的格外重视。对于西方人来讲最不可理解的事，就是中国人怎么会将那样大量的时间耗费在食品的挑选、制作和享受上。

中国人的对饮食的注重态度，从大量的食经和有关诗文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一点同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绝不相同，反差十分明显。林语堂的《中国人的饮食》一文，对这一现象做过对比研究，很有意思，他写道：

没有一个英国诗人或作家肯屈尊俯就，去写一本有关烹调的书，他们认为这种书不属于文学之列，只配让苏珊姨妈去尝试一下。然而，伟大的戏曲家和诗人李笠翁却并不以为写一本有关蘑菇或者其他荤素食物烹调方法的书，会有损于自己的尊严。另外一位伟大的诗人和学者袁枚写了厚厚的一本书，来论述烹饪方法，并写有一篇最为精彩的短文描写他的厨师……法朗士则是袁枚这种类型的作家，他也许会在致密友的信中给我们留下炸牛排或炒蘑菇的菜谱，但我却怀疑他是否能把它当作自己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传给后人。

对食品文化的研究,离不开对食品文化文献的研究。

文献是指人类活动所留下来的一切印迹,或者说可资说明人类活动的一切资料都是文献。其载体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影像的,其形式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图画的,等等。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文献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从事食品文化研究,同样也离不开食品文化文献。

谈到食品文化文献,首先涉及对文献内涵的界定。“文献”一词出现很早,其内涵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解:“文,典籍也;献,贤也。”可见,文献最初是将人和书结合在一起,分别指典籍和宿贤,即记载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以及熟悉典章掌故的故旧耆老和博学多闻之人。应该说,孔子时代由于文字书写和书籍传播的不易,与作为“典籍”的“文”并举,“献”应指前述熟悉典章掌故的故旧耆老和博学多闻之人的口头言论。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第一部以“文献”作为书名的著作,马氏在自序中对“文献”的释义亦兼指书籍和人的言论两个方面:“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但从所述“献”的具体内容来看,“献”实际上已指文字记载的人物言论,则其所谓“文献”,即指各种各样的典籍和文字记录,相对于孔子所说“文献”,其范围已有缩小。此后人们提及“文献”一词,往往即成为典籍的代名词,如明代司马泰编《文献汇编》以及《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等。随着近现代以来人类文明的进步和考古新发现,“文献”的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

83)给“文献”下的定义更为广泛:“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些载体除纸张外,还包括甲骨、青铜、金石、竹木、缣帛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食品文化文献的范围非常广博,除常见的饮食文字资料外,诸如出土或遗存的饮食原料、饮食器具等实物,与饮食有关的图画、雕塑、书法等艺术作品,饮食歌谣、传说等口头资料以及约定俗成的饮食风俗习惯等等,无所不包。比如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东汉的一个青铜蒸馏器,经实验,至今仍然可以馏出酒来。可见早在公元初年,中国就已经掌握了蒸馏知识,具有蒸馏设备,这也就否定了一些人所说的蒸馏酿酒是宋元时期从外国传入的说法。

本书所说的食品文化文献中的“文献”,一般就是指的广义范围而言。

第一节 中国古代食品文化文献

我们伟大的祖国拥有璀璨的文化典籍,并以历史文献名邦著称于世。在这些文献里,有着丰富的饮食生活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并不集中于某几部书内,而是散见于经、史、子、集和无文字记录的史料中。以往一些学者,常常苦于饮食生活的资料缺乏,而难于开展研究工作。因此,如何检索历代的饮食生活资料,是我国文化史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

一、无文字的饮食文献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有关饮食生活史的文献,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文字记录的,一类是有文字记录的。无文字记录的史料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遗物,一种是人们口头传说和风俗习惯等。这里我们着重介绍古代人们在生活中留下的各

种艺术品的遗物,因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不仅创造了可供生存的饮食,而且还创造了反映当时人们饮食生活的各种艺术品。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文化艺术作品,观察到人类的饮食是如何发展,人类是如何为食而做努力的,这对复原古代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有着很大的帮助。

(一)原始社会的艺术作品

在原始社会的造型艺术中,彩陶是富有特色的工艺美术品,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特征,它体现了当时绘画艺术的水平 and 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彩陶上美丽的花纹图案,从简单的几何纹饰到动植物纹样,朴素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类的渔猎、采集的饮食生活。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距今已有大约五六千年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彩陶有陶盆、陶罐、陶壶、陶碗等饮食器具,制作者在这些饮食器具上描绘出各种纹饰,如几何图形、人面纹、鱼纹、鸟纹、蛙纹、鹿纹等等,形态别致,富有生活气息。

饮食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彩陶艺术如此丰富多彩,优美而又实用,是由于它植根于当时人们的饮食生活之中。例如彩陶纹饰中的鱼、蛙、鹿、鸟,植物的枝叶、果实等,都是人们在采集、渔猎、农耕等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食物。例如,在河南庙底沟出土的彩陶上,大量的植物纹装饰,反映出中原地区的居民这时的农业生活已十分发达。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彩陶上,动植物纹样各占有一定比例,说明他们是以渔猎和农业为生的。稍后于马家窑的西北地区半山和马厂文化的彩陶上,以植物纹为主,在某些彩陶的纹饰中还反映着农业作物图案,可见半山、马厂居民的饮食是以农作物为主的。由此可知,彩陶是远古时代人们饮食生活实践的产物,彩陶艺术的发展是与远古人们饮食的发展相一致的,彩陶艺术对于帮助我们了解先民的饮食结构,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二)商、周青铜饮食器及其纹饰

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我国进入了青铜时代的初期,这也标志着我国社会步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期。

目前保存的青铜器,光是铸有铭文的就有上万件,不铸铭文的青铜器,无疑要多得多,这其中又以饮食器为主。食器有鼎、鬲、甗、簋、簠、盥等,酒器有爵、觚、斚、尊、壶、卣、罍等。在这些青铜饮食器类方面,西周和商是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的,但两者又各有其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商代青铜器中以酒器的门类最为丰富,西周时代则着重于发展烹饪食器。

根据墓葬发掘的材料,商代最简单的青铜酒器是以爵、觚、斚合成一组。爵是三足有流的酒杯,觚是容酒器,斚是灌酒器。在这一基础上扩大和发展,又增添了盥、尊、卣、壶、罍等中型、大型的饮器和容酒器。此外,更高级的容酒器还有方彝、兕觥、牺尊等。这些五花八门的青铜酒器的存在,反映了酒的消耗数量很大,而这是需要以大量粮食的消耗为前提的。它反映了商代农业生产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贵族们剥削和榨取到的粮食愈来愈多,因而能够大量地酿造各种酒类。另外,酒器的品种和数量之多的情况表明,商代奴隶主贵族上上下下沉湎于酒的情形确实存在。这些豪华的青铜器中酌享的美酒,都是用奴隶们的劳动和智慧酿制而成的。

周朝人们的习惯与殷人不同,周初的酒器大为减少。在取得政权以前,周人也没有大量饮酒的风俗。周武王伐商,历数商纣王的罪状,酗酒便是其中之一。以此作为鉴戒,颁布《酒诰》,^①严禁周人酗酒。这就是周代初年青铜酒器大为减少的原因。

青铜器的比例大为减少,食器的数量就相应增加,西周青铜食器的主体是鼎、鬲、甗和簋、簠。周代贵族列鼎而食,所谓列

^① 《尚书·酒诰》。《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

鼎是指大小相次成单数排列的盛放各种肉食的鼎。贵族等级愈高,使用的鼎愈多,他能享受到肉食类的品种也愈多。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宗周王臣的礼数也与此相仿。西周列鼎制度的存在也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宝鸡茹家庄强(渔)伯之妾的墓中,发现了五件一组的列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发掘的情况,按墓的等级不同,随葬的青铜鼎有七件、五件和三件之分。这种青铜列鼎的陪葬制度,所反映的正是西周以来统治阶级各种等级的差别。

青铜簋是盛饭食的器物,它的使用和鼎不同之处是以偶数组合。据记载,天子用八簋,诸侯六簋,大夫四簋,士二簋。传世的青铜簋,也以偶数为多。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中,随葬的青铜簋有六器、四器和二器之别,与记载的情况相符。这些都是统治者等级差别的明证。

周代减少酒器的铸造,并不是要禁绝饮酒,不过是要有节制而已,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主要是壶和盃。一组青铜饮食器中,通常要配一对方壶或圆壶。盃是调酒的器皿,主要用来盛水调和酒的浓度。但是,终周之世,青铜酒器的铸造从未达到商代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代青铜鼎上,常装饰有一种名为饕餮的花纹。它是一些被夸张了的或幻想中的动物头部的正面形象。这种纹饰,是宋朝人根据《吕氏春秋》一书而定名为饕餮纹的。《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左传·文公十公年》亦曰:“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谓之饕餮。”这些古代神话传说都说明饕餮是非常贪吃的。周人在青铜饮食器上装饰饕餮纹是有深意的,它主要是告诫人们不可贪于饮食,贪吃必将害己,因此,饕餮纹实际上反映了周人提倡饮食节俭的思想。

商、西周青铜饮食器上的纹饰内容,绝大多数都与当时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有些是人们常吃的动物,如鱼、蛙、龟、羊、牛、鸟